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 ③

日清、日俄戰爭

原田敬一◎著 徐靜波◎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前言——致日本和亞洲 11

第1章 初期議會 21

一、憲法的實施 23

二、第一屆議會的攻守 32

三、轉向積極主義 42

第2章 條約修改 53

一、西伯利亞鐵路與日本 55

二、與議會的繼續對立 62

- 三、伊藤博文與自由黨的摸索 68
- 四、條約修改與帝國議會 75

第3章 日清戰爭……………87

- 一、脫離了外交協商 89
- 二、朝鮮與日本的民眾 93
- 三、走向開戰 102
- 四、戰爭的實相 114
- 五、從戰爭結束到戰後 128

第4章 征服台灣的戰爭……………141

- 一、殘酷的征服 143
- 二、「外地」的誕生 152
- 三、膨脹的逆流 163

| | |
|---------------|-----|
| 第5章 日清戰後與國民統合 | 169 |
| 一、「戰後經營」的開始 | 171 |
| 二、近代法體系 | 182 |
| 三、「戰後經營」的政治 | 185 |
| 四、國民統合的進展 | 201 |
| 第6章 民友社與平民社 | 217 |
| 一、戰爭與底層 | 219 |
| 二、文學與社會 | 232 |
| 三、媒體的成熟 | 236 |
| 第7章 日俄戰爭與合併韓國 | 251 |
| 一、被推開的大門 | 253 |
| 二、日俄戰爭 | 275 |
| 三、媾和的動向 | 284 |

| | |
|------------|-----|
| 四、戰爭的記憶 | 293 |
| 五、走向對韓國的合併 | 299 |

| | |
|-------------------|-----|
| 結語——「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 | 310 |
|-------------------|-----|

| | |
|----|-----|
| 後記 | 317 |
|----|-----|

| | |
|------|-----|
| 參考文獻 | 319 |
| 大事年表 | 329 |

京都市偶
人與東京
式偶人

三月份將要來臨時，各家偶人店裡的女兒節偶人的櫃台就相當的熱鬧。穿著天皇皇后衣飾的男女對偶的站立方式有兩種：正面的男性偶人站在右面的「京都市」和站在左面的「東京式」。在岐阜縣高山市舉行的「飛驒偶人節」時，市內各家所裝飾的對偶，兩種排列方式都可見到。從「天子南面東立」的中國王朝的傳統來說，「京都市」是對的。

那麼，「東京式」是為甚麼、又是在甚麼時候產生的呢？這與十九世紀中葉時江戶時代的社會風俗和習慣轉換成歐洲的樣式這一大趨勢很有關係。當時的人們有著強烈的「歐化」意識，覺得從歐洲可以學到的東西，要比從原先的先進國家中國和朝鮮多得多，這樣的一種社會潮流，從江戶幕府的末年開始漸漸興盛起來，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國家性的判斷了。天皇家族，在以前歐美為範式實現立憲制的同時又擁有王權，當他們以這種新的形式再次出現在政治舞台的時候，其站立方式也變成歐洲式了。（若桑綠《皇后的肖像》）戰前各家各戶家裡的牆上所掛的天皇皇后的相片，是橫向的左右排列，而在小學舉行儀式の時

候，根據上面的指示（一九〇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山梨縣的訓令等），兩個人的「御真影」要朝向南面，那麼從正面看過去，左面是天皇的肖像，右面是皇后的肖像。這就是「東京式」在全國傳開的背後的原因。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皇太子嘉仁親王（就是後來的大正天皇）與九條節子的婚禮，是在神社舉行的「神前婚禮」，這在天皇家族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一般日本人的婚禮，是在自己家裡舉行的三叩九拜的儀式（也就是所謂的「人前婚禮」），從那以後，人們就以皇室的婚禮和基督教的教堂婚禮為楷模，廢棄了從前的傳統方式，日比谷大神宮就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了神前婚禮，並在各地傳開。明治維新這一政治性的事件通過文化形式的展開，使得「歐化」的大潮自上而下地席卷了整個「日本」。那麼日本人是如何學會了「歐美」模式的呢？

來自歐美

有關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至一八七三年岩倉海外使節團^①在歐美的見聞，久米邦武的《美歐回覽實記》中已有很詳盡的記述，他

^①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明治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全權大使的使節團赴歐美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事宜，這一目的雖未達成，卻因此廣泛考察了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隊諸種實況，決定以歐美諸國為楷模推進全國的近代化進程。——全書腳註均為譯者註。

們確實廣泛考察了歐美諸國的自然環境和國家形態，然而他們的興趣，還是在於「富國強兵」政策。昔日江戶幕府舊臣的成島柳北^①，這一時期是在法國，他看到了一個「有著劇場和美術館的巴黎」，而使節團一行，則必須要看「有著要塞和工廠的巴黎」。（前田愛《成島柳北》）他們對歐美訓練有素的軍隊大感震驚，他們認真參觀了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維斯卡公司，在普魯斯仔細考察了克虜伯公司。日本為了要擁有並有效使用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怎樣相應的變化，這一點是理解日本近代史所不可欠缺的。自一八九四年開始的十年中，近代日本經歷了三次戰爭，我們當然必須看到因戰爭這一外在的壓力和軍隊這一內在的壓力而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的這一歷程。

這一拚命學習西方的結果，就是使維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國家財政幾乎一直處於盈餘的狀態。可以說，岩倉使節團所學到的東西結出了果實。他們必須在與民權派處於緊張關係的同時，努力推進內政的改革，這一關係，到了「初期議會」的時候，就更加激化了。正是帝國議會的激烈討論和爭執，才帶來了「初期議會」時期的健全的財政。不應該以狹隘的視野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爭執簡單地看

^①成島柳北（一八三七—一八八四），日本近代的新聞記者、隨筆家，江戶末年曾擔任幕府的會計副總裁等職，一八七二年漫遊歐美，以《柳橋新志》而揚名文壇，後擔任《朝野新聞》社長，被視為民權派媒體人的領袖。

作權力鬥爭，而應該在圍繞如何理解近代國家這一基本構想而出現的歧義這一語境中來重新認識。在上一卷裡敘述的對立和競爭，在本卷中仍將持續。

來自亞洲

亞洲各國所認同的是「初期議會」時期的日本，也就是說在推進歐美的近代化的同時，經過了與民黨^①的爭執和紛爭，建成了立憲制的「小政府」和議會。正在拚命摸索獨立的國民國家進程的朝鮮（韓國）、努力設法使衰退的能量重新復活並使王朝繼續得以傳承的清國等，之所以積極地向日本派出留學生，是因為可以從中就近學習歐美文化，將其作為一個鄰近的家庭教師。清國的一位權威的政治家張之洞表示「中（清國）東（日本）之勢力、風俗相近，易仿行（模仿）」，因而倡導留學日本。（《勸學篇》）清朝末期留學日本的人數，據說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達到了八千人。求知的慾望將許多青年人引導到了未知的小國日本。

原本在日本和中國並無支持眾多的留學生出國求學的國家性制度，因為歐美列強試圖在經濟上向亞洲地區強勢進入並擴展他們的權益，因而使得亞洲國家

^① 指早期日本的議會中與政府對立的自由黨、改進黨等政黨，大致類似今天的在野黨，受政府支持的政黨則被稱為「吏黨」。

產生了「亞洲危機」的意識，亞洲各國和地區也以紡織業和原有的產業為核心，努力推進近代國民經濟的形成。在這過程中，建起了印僑和華僑等廣泛的人際網絡。（龍谷直人《亞洲國際通商秩序與日本》）正是這樣的人際網絡，成了接受留學生的另一個基盤，也是靠了這樣的人際網絡，康有為、孫中山等政治流亡者來到了日本。甲申事變^①失敗之後，金玉均等朝鮮政府的高官也流亡到了日本。印度的鮑斯^②流亡到了日本，在東京受到了「中村屋」老闆相馬愛藏和黑光夫婦的厚遇，這已為人們所熟知。對於他們的流亡日本，面對歐美列強和清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當時無法進行正面的有力應付，無法成為他們的倚仗者，但是流亡者們依靠了在亞洲貿易中形成的人際網絡，冒著危險來到了日本。與當權者可以恣意妄為的亞洲其他地區不同，在法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近代日本，其依法行政的國家構造也許成了他們另一個可以依靠的條件吧。與江戶時期的法律制度已經做了切割，以歐美諸國的法律為範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過程，也是這一時期需要討論的課題。

① 指一八八四年農曆甲申年發生在朝鮮的、由日本支持的開化黨人金玉均等發動的試圖推翻舊有朝廷的政變，後在中國的武力干預下遭到失敗，金玉均等逃至日本。

② 鮑斯（Rash Behari Bose，1886-1945），印度獨立運動活動家，一九一四年流亡到日本，成為餐館「中村屋」老闆的女婿，後加入日本國籍，與孫中山有交往。與另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鮑斯（Chandra Bose）並非同一人。

文明文化 的雙向性

近代日本在學習歐美文化方面，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導致了一九四五年日本的徹底失敗，這些內容將在下面幾卷中會有敘述吧。問題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是單方面所強調的。日本消化了歐美的文化，創造了許多翻譯詞語，然後將其傳到了清國和韓國等的漢字文化圈，人們只是單方面地強調這一些，而這些卻是被敘述得過分了。

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文明，首先消化了歐洲的文明，然後將其輸送至亞洲，這些事實為何被如此簡單地遺忘了呢？日本首先是通過中國將歐洲語言的知識譯成了漢文的文獻才達到了對世界的把握。地球、地中海、紅海、熱帶等的地理詞語，病院、大學、文科、理科等的社會性詞語在日本的使用，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如略所撰寫的五卷本世界地理著作《職方外紀》在一六二三年出版了漢譯本之後，傳到了日本的結果。數學上也一樣，在中國被翻譯的詞語就這樣拿到了日本使用，現在甚至有些詞語它原本的意思也搞不清楚了。比如幾何、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等等。在中國創制的「萬國公法」一詞，後來被箕作麟祥^①創制的「國際法」一詞取代了，但是表示溫度的「攝氏」、「華氏」現在仍

^① 箕作麟祥（一八四六一—一八九七），日本法學家，曾留學法國，主持過西洋法律文書的日文翻譯。

在使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各種各樣的西方書刊需要被翻譯過來的時候，這一傾向就越加明顯了。一八一〇年代，人們編纂了《英華辭典》，被譯成漢文的樣書，幾乎都以相當的數量被運送到了江戶末年的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卷本的W·羅布存德^①的《英華辭典》（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九年）和J·杜立德^②的《英華萃林韻府》（一八七二年）。羅布存德的辭典，後來也可能反過來從日本傳到中國去，但其前提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在清國已經有了洋書的翻譯活動。

確實，自杉田玄白^③的譯本《解體新書》問世以來，翻譯的領域從醫學擴展到了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等，這樣就產生了許多日本創制的新詞語。即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也必須指出，他們的開創性業績，也是依靠了漢字的表意性特點，將漢字詞語所擁有的造詞能力發揮到了極致。比如像「重力」一詞，就是糅

① 根據日語發音查尋到的西文原文是 Wilhelm Lobscheid (1822—不詳)，一八四八年在香港從事佈教活動，一八五四年作為美國東印度洋艦隊的翻譯在日本逗留約半年。他所編撰的《英華辭典》後來流入日本，在日本影響頗大，一八八三年在日本出版的《英華辭典》增訂本上，原著者的姓名用漢字標為「羅布存德」，有的標為「羅存德」。

② 原文應為 J. Doolittle。

③ 杉田玄白（一七三三—一八一七），江戶後期的醫生，與人合作將德國人所著的 *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圖譜）譯成《解體新書》出版，影響甚大。另著有《蘭學事始》。

合 (合 zwarte (重) 和 kraft (力) 的意思。「焦點」一詞，也是糅合了 brand (燃燒) 和 punt (點) 的含義，這也是熟知漢字詞語威力的江戶時代的知識人才可能創造出來的新詞語。(吉田忠《從〈解體新書〉到〈西洋事情〉》、湯淺茂雄《明治時期的專門用語與漢字》) 後來成了日本近代化領袖的福澤諭吉，他的啟蒙對象是普通的國民，因此他在翻譯的時候，也用心良苦地盡可能避免難懂的生僻造詞，而是用能夠達意的詞語，所以他藉助清朝的《康熙字典》來搜尋詞語，創造出大家所熟悉的詞語。比如根據「汽」一詞創造出了「蒸汽」、「汽船」、「汽車」等新詞。所謂「歐化」的學習消化，是亞洲人的共同努力才最終完成的。(同上出處) 這種知性的力量，在近代日本是以怎樣的形態被繼承和增大了呢？

近代日本 和亞洲

根據對現代日中兩國使用的漢字詞語的實際狀況的調查研究，學界認為，字體相同的詞語，百分之六十八是來自於中國的古典，百分之二十七是源於日本人的創造。(高野繁男、王寶平《日中現代漢語的層別》)

總的來說，這顯示了中國漢字詞語的強大的表現力，不過在軍事用語和經濟用語方面，近代日本所創造的詞語比較多。在東亞各國共同創造詞語的過程中，從日本傳入的詞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從詞語的層面顯示了日本的軍事力量 and 經濟

力量在亞洲不斷壯大的事實。迅速崛起的亞洲小國，是如何來建構它的對外關係的呢？這也是本卷要討論的課題。

本卷在「日本近現代史」系列中要負責的是從第一屆帝國議會舉行的 一八九〇年至日俄戰爭結束的十五年歷史，考慮到日俄戰爭導致的國際政治的結果是對韓國的合併，因此實際上的敘述會稍稍延長到一九一〇年。本書將從亞洲和世界的視野來考察這兩場戰爭給亞洲與日本的國家和社會帶來了怎樣重大的變化。

本書引用的史料，考慮到書頁的空間和便於讀者理解，在對原文進行充分體味之後，有部分譯成了口語體。此外，將詞語中混雜的片假名改為平假名，也有部分將漢字改為平假名的。另，引文中〔 〕內的說明，為作者所加。

第1章 初期議會



「輪流蹲在洗澡桶内」。自左至右是松方正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黑田清隆。這是諷刺一八八五年開始這四個人輪流組閣的情形。(田口米作畫，《團團珍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憲法的實施

土耳其與 日本

金子堅太郎^①在宮中信心滿滿地說，土耳其是失敗了，但是日本能夠成功，我們從他們的事例中受到了激勵。在這次相隔一年之後的拜謁中，金子堅太郎向明治天皇報告了出訪歸來的情況，歷時一個多小時。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回國的金子，翌日上午向山縣有朋首相做了出訪報告，八日致函伊藤博文（其時伊藤已從第一線退了下來，擔任宮中顧問），十九日向明治天皇作了回國的稟報。說是稟報，實際上卻是像做演講，「天皇特別賜坐，囑其可暢所欲言」（《明治天皇紀》七），意為天皇讓金子坐了下來，准許他盡情陳述。當時，山縣有朋也奉命陪坐在側，在一旁洗耳恭聽。

金子向天皇陳述的內容雖然不得而知，但應該與他六月二十五日在國家學會例會上所作的報告「歐美見聞意見」差不多吧。亞洲的君主國土耳其，比日本早十四年，即一八七六年十二月頒佈了帝國憲法，翌年三月舉行了第一屆議會，

^①金子堅太郎（一八五三—一九四二），日本近代政治家，曾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律，參與明治憲法的制定，在伊藤內閣中先後擔任農商務大臣和司法大臣。

不過由於俄土戰爭的爆發和土耳其皇帝阿卜杜爾·哈密特二世的專制統治，使得立憲制形同虛設。在土耳其歷史上被稱為「遵命議會」的這屆議會，在當年遭到解散，憲法也被迫終止實施。某位歐洲人舉出了這一事實後頗為不安地告訴金子說：「亞洲種族的人要想實施歐洲式的憲法，迄今為止還沒有成功的案例。」金子的報告中說，他聽了這段話，收到了極大的衝擊，「彷彿被重錘一擊，頭腦也要被敲破了。」他強調說：「我們憲法實施的情況怎樣，將成為日本走向恥辱還是光榮的分界點。」在他的報告中，兩次出現了「土耳其的覆轍」這樣的詞語。在報告的最後金子慷慨陳詞說：「我們將以滿腔的熱血，不惜犧牲生命來完成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憲法實施。」他的這一悲壯的決心，大概在十九日的進宮謁見中也做了表示，並贏得了天皇和山縣首相的共鳴吧。

「憲法的實施」，其初步的實踐，具體體現在五個月之後的十一月召開的帝國議會的第一屆會議（以下簡稱第一議會）的運營、尤其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民意決定的國家預算的制定和通過上。與其說是隔岸旁觀不如說是刮目相看的歐美人對日本的評價，全都與此相關。

第一屆議會上，出現了政府的「軍備擴張」政策與民黨（在自由民權運動中

成長起來的反對藩閥的政黨）的「讓民眾休養生息」的要求之間的對抗，因政府與民黨之間的對立而使議會充滿了生氣，政府和議會都意識到了，亞洲區域的立憲政治能否成功，將會具有「世界史」的意義。這一點，作為民黨領袖的板垣退助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當他們在為第一議會上能否通過預算而感到緊張時，恐怕他們也真切感受到了自己在「世界史」上的角色了。

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人，將由藩閥政治家和官僚為主體來進行政府運作看做是日本政治的常道，並將其稱之為「超然主義」。但是，伊藤博文的盟友井上馨卻在積極準備組織一個有政府背景的政黨「自治黨」（最後失敗了），軍人政治家島尾小彌太也在努力組織一個「保守黨」。這些政黨都被稱為是親政府的「吏黨」。伊藤和井上等人承認政黨是議論政策的集團，他們並非完全反對建立政黨。

內閣改造

面對第一屆議會，山縣首相改變了組閣的方針。當初他想安排伊藤博文在內閣中擔任內務大臣，但伊藤沒有應允，無奈之下山縣就決定對內閣進行重組，不再安排伊藤博文的位置。他讓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轉任內務大臣，將同屬薩摩藩的樺山資紀海軍次官升任海軍大臣。他更迭了文部大臣的人

選，由內務次官芳川顯正來接替原來的榎本武揚，並免去了岩村通俊的農商大臣的職務，改由駐美大使陸奧宗光來接任。他起用了看上去與民黨關係不錯的陸奧宗光，很明顯其目的是為了應對議會中的民黨。

對起用陸奧和芳川的方案，明治天皇表示了不以為然。天皇指出，陸奧曾有過捲入西南戰爭^①而被入獄的政治犯經歷，而芳川則缺乏人望。明治天皇經常會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斷，常常介入實際的政治，但這次因為是第一次面對議會，最後還是聽從了山縣的安排。

內閣的權力構造

上述的內閣重組完成於五月十七日，是在大選之前四十四天的時候。對於二十世紀之前的日本政府，人們多用「藩閥政府」來稱呼。其內涵是根據舊藩的人脈，一開始是「薩摩長州土佐肥前」諸藩為主體，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政局大變動以後，則演變成了以「薩摩長州」為主體的格局，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對於這種以藩閥人脈出發來選用官員

^①指發生於一八七七年、起源於鹿兒島的下層武士等反叛明治政府的戰爭，後被政府鎮壓，其領袖西鄉隆盛自刃身亡。

的現象，最近的研究指出，在這樣的權利構造中存在著兩種權力。（佐佐木隆《藩閥政府與立憲政治》）

明治維新以後第一代的掌權者三條實美、岩倉具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在一八八〇年代後期消失之後，第二代掌權者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山田顯義這些長州派的人物，黑田清隆、西鄉從道、松方正義、大山巖這些薩摩派的人物，已經積累了政治的經驗，成了一八九〇年代維持政權所不可或缺的人才。本書在稱呼這些人的時候，使用「元勳級」這樣的詞語，其含義與「元老」不同，後者是由明治天皇親自對他們分別發佈的敕諭而形成的稱號。這八個「元勳級」的政治家所引導的方向，決定了具體的政治運作的展開。不管他們具有怎樣的官方地位，他們都擁有一「事實上的權力」來左右現實政治，這就是「藩閥政治家」的實際形態。一八八五年內閣制度建立的時候，伊藤內閣的十名內閣大臣中，「元勳級」的人物全都在內，「事實上的權力」與「制度上的權力」達到了一致。接下去的黑田清隆內閣中有七個人、山縣內閣中也有五個人擔任內閣大臣。

就如明治維新的第一代政治家以他們肉體生命的存亡顯示了他們政治權力的消長一樣，第二代政治家也發生了同樣的問題。在此之際，他們與第三代政治家

之間發生了怎樣的權力抗爭和問題呢？

帝國議會、最初 的選舉

帝國議會成員的遴選，從貴族院開始。貴族院裡所有成年以上的皇族、公爵、侯爵都是貴族院議員（共計三十八人），伯爵、子爵、男爵則由其彼此間的互選而成為議員（共計一百零五人），每個縣從其納稅最多的十五個人中選出各自的議員（共計四十五人），另有一部分所謂的敕撰議員，是由內閣提名、天皇任命的，他們的人數，不能超過皇族和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議員人數（第一屆議會敕撰議員有六十人）。貴族院由上述議員構成。

第一屆眾議院大選的二十天之前，即六月十日那天，各個府縣全都召開了互選會，為的是從大額納稅者中選出議員。在當選者的四十五人中，有地主二十二人、實業家二十一人。人均年度納稅額是一千五百日元，地主階級則人均擁有兩百公頃的土地，相當於當時自耕農人均一公頃土地的兩百倍。他們中間也有五個人在從事著自由黨或立憲改進黨的政治活動。但是，帝國議會的初期選舉，實際上是由互選會來選舉有產者，這一事實充分表明了政府對議會是抱著怎樣的期待。



圖 1-1 第三屆國內勸業博覽會。一八九〇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行。第一次大選的投票日期是七月一日。圖中天皇在左，皇后在右。（豐原國周畫，一八九〇年）

第一次 大選

於是七月一日在全國統一進行了眾議院議員的大選。有選舉權的，僅限於年度繳納國稅十五日元以上的男子，全國共四十五萬人，不過佔四千萬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很多都是經營農業的地主和自耕農階層，不過他們得到了與身份無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選的議員可以自己決定稅金的支出法和其他法律。全國共有一千五百個獲選人，結果這些當選者在五倍的競爭率中脫穎而出，成了議員。

來自於被稱為民黨的政黨的當選者總計一百七十名，佔半數以上。政府選擇了全國勸業博覽會開幕的這一天為大選日，並且已有了從高額納稅者中選出貴族院議員的前例，但最終眾議院的選舉結果，卻證明了政府試圖製造這樣的氛圍的徒勞。民黨也沒能夠建立一個統一的大政黨，不過在大選前的五月十四日，愛國公黨（板垣退助派）、自由黨（大井憲太郎

派)、大同俱樂部(河野廣中派)這舊自由黨系統的三派實現了「自由主義派」的聯合，決定建立一個統一的政黨。八月二十五日，他們決定成立包括九州進步黨(也稱為九州同志會)在內的立憲自由黨，九月十五日舉行了成立大會。

伯爵子 爵男爵 的選舉

大選結束十天以後的七月十日，舉行了伯爵子爵男爵的互選會。爵位主要是授予那些江戶時代的公卿、大名，還有在明治維新中立了功績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勝安芳(上述為伯爵)等人，期望他們能成為「皇室的藩屏」。伯、子、男爵的互選會，也有諸如菟蒻版(平版印刷的一種)宣傳傳單的發送等活動，在競爭形式上與眾議院議員的選舉一樣。競爭激烈的原因之一，是議員的年費吧。無需選舉便自動成為議員的皇族、公爵、侯爵是沒有年費報酬的，其他的貴族院議員則有每年八百日元的報酬。

九月二十九日，發表了六十名救撰議員的名單，這些人被認為是「對於國家具有功勳或是有學識的人士」，由內閣提出推薦，並由天皇任命的。從民間推選出來的有澀澤榮一(第一銀行行長)、岩崎彌之助(三菱的老闆)等人，另外從原來的元老院(帝國議會開設的同時元老院就廢除了)成員中推選出了二十七名

議員，還有，從法制局和中央政府各省廳中也推選了若干名，目的是要將貴族院成為政府一派的根據地。板垣退助也受到了天皇的任命，但他拒絕了。距離第一屆議會的舉行雖說還有兩個月，但還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

集會及政

社法

在眾議院的席位中未能獲得過半數的政府，重新審議了一八八〇年四月制定的集會條例，於七月二十五日重新制定了《集會及政社法》。該法案簡化了集會的手續並縮小了在場警察的集會解散權，在內容上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禁止政治社團開設分部，也禁止政治社團與其他社團之間的聯繫通信，政府通過法律手段限制民黨之間的聯合。

在新的法律中，增加了兩條內容，禁止未成年人和女性參加政治集會和加入政治社團，不允許在帝國議會開會期間在會場的九公里之內舉行戶外集會和示威遊行。後者是要限制民黨的院外政治活動，而這正是民黨的重要構成要素。政府害怕議員受到院外政治活動的影響而發生心猿意馬，無法集中思想討論通過議會的決定。這一法案內容，顯示了政府的一個樂觀想法，即他們認為，以地主階級為中心的眾議院議員，在國家意識和歷史意識上是與政府持同一立場的，在「實施憲法」這一課題上也是與政府持合作態度的。

伊藤貴族 院議長

貴族院的議長、副議長不是由選舉產生的，而是採用天皇選定和任命的制度，但卻不容易決定。山縣有朋等為了能使議會的運作順利進行，希望得到伊藤博文的襄助，但伊藤卻一直拒絕。

事態發生變化的是在十月下旬。在天皇熱心的勸說下，伊藤終於表示應允，但條件是只擔任第一屆議會的議長。十月二十四日，發佈了天皇的任命詔書，議長伊藤博文、副議長東久世通禧。通過天皇懇請才屈就議長職位，伊藤博文的政治手腕恐怕使周圍的人都大吃一驚吧，而明治天皇如此介入政治的姿態，也有些近似「天皇親政」了。距離第一屆帝國議會的召開還有一個月。據說這一天，天皇享受了時隔半年的騎馬樂趣。

二、第一屆議會的攻守

第一屆議 會與地租 減輕

第一屆議會，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二十九日開幕，翌年三月七日閉幕。在此九十天的會期內，討論了政府提出的十項議案、眾議院議員提出的四十一項議案、貴族院議員提出的兩項議案，總共五十三項，而通過的只有六項（政府提出的四項、眾議院



圖 1-2 第一屆議會召開的眾議院。這是一幢建於日比谷一角的木結構的臨時國會堂，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日被燒毀。（比戈畫，《日本回聲》，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議員提出的兩項）。最大的焦點是國家預算案，首先提交給在憲法上具有優先審議權的眾議院。

十二月八日開始的預算委員會會議，到了二十七日才總算議決了一項將原來的年度支出預算減去八百零六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日元的審定案。這項審定案完全沒有觸及到軍備擴張的費用（純粹的軍費減少了五萬日元），並沒有違逆山縣有朋提出的富國強兵的「國是」。審定案的《說明書》中明記，「將此費用用作減輕地租的資金」，即將減去的費用用於減輕地租。眾議院的大多數成員，在

節減政府經費和減輕地租方面達成了明確的一致意見。

在這樣的情形下，多次舉行了內閣會議，在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二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在討論節減所得的金額用途時，主張將該經費額度充作減輕地租的意見，得到了諸大臣的同意，雖也有一兩名大臣對此表示了異議，但在內閣會議上基本定了下來。」（《秘書類纂》原本）出席會議的山縣有朋首相等八人，在如



圖 1-3 被發現的內閣會議決議，從《秘書類纂》的原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中找到的，此書是用伊藤博文身邊的機密文件編纂而成的。

與營業稅等的新稅案，需要填補此項的費用需事先獲得議會的同意。

就這樣，政府決定採用地租減輕的政策，但卻並未對外公佈。不過作為財源的五百五十萬日元的籌措，與眾議院通過的八百零六萬日元的削減審定案的內容不一樣。眾議院多數派的意見是，將地租減輕的實施與作為其財源的政府經費削減組合在一起同時進行，而一月十二日的內閣會議，則是認可眾議院的意見，先將輿論擺平，而在財源問題上，則以憲法第六十七條為後盾，並不認可眾議院多數

下的文件上畫押蓋了章。這是最新發現的新史料（圖 1-3）：

第一案 自（明治）二十四年第一期分地租開始，實行田地五釐減，其財源，兩百萬日元來自經費的削減，三百五十萬日元由充作海軍別項費用的五百萬日元內支出，海軍的費用再從往後的年度財政收入的結餘或其他財源中獲得，並經議會的同意。二十五年度以後，開始實施經費削減及所得稅修正

派主張的大幅度削減政府經費的方案，而是主張從並不觸及憲法第六十七條的部分削減政府經費後獲得的兩百萬日元，和用於擴張海軍的「海軍別項費用」中百分之七十的三百五十萬日元中來確保其財源。在內閣會議上，有人認為，倘若不實行地租減輕，「無疑會違背眾議院的意見，會在眾議院中產生不滿」，最後會導致與眾議院的決裂。（《經過說明書》）很明顯，大部分的內閣大臣，還是認可眾議院多數派的意見的，試圖與眾議院達成妥協，以便通過預算案。

所謂憲法第六十七條是甚麼呢？它是政府和非民黨體系的大成會等激烈反對眾議院八百零六萬日元削減審定案的依據，這項審定案包含了中央省廳的廢除與合併、官員費用的削減等內容。憲法第六十七條的內容具體是這樣的：下述三項如果未得到政府的同意，帝國議會不可對其進行廢除和削減。（一）基於憲法大權的既定的年度支出（根據官方的解說書《憲法義解》，既定的年度支出是指「官制、陸海軍的編制所需的費用，文武官員的俸祿」等）；（二）依據法律結果的年度支出（「議院的費用、國家給予的年金、根據法律的官制費用及俸祿之類」）；（三）政府的義務年度支出（「國債的利息及其償還、公司營業的補助及擔保」等）。一八九〇年六月三十日的《時事新報》對此批評說，照政府的說法，「六千幾百萬」都是既定年度支出，議會所審議的，不過是區區「一千幾百萬」而已。問題的焦點是，

六十七條所說的費用的削減，議會該在審議預算的哪一個階段徵求政府的同意。

「中等以下人民的意願」

法制局長井上毅，自大藏省次官渡邊國武那裡聽取了一月上旬內閣會議的情況後，發佈了實施地租減輕的公報，而其財源的籌措則日後再商議。他在信函中表示了內心的擔憂：如果財源籌措的方法（比如將營業稅定為國稅等）遭到否決的話，「就會導致今後無法施行的結果，由薩摩藩長州藩主掌的政府就會內外交困，難以為繼，在近日恐怕會提出內閣辭職。」（一月九日的信函）

在第一屆議會的開會期間，收到了一份意見書，井上對此進行了修改增刪，自己將其命名為「經費節儉論」。該意見書的前文中說，政黨的「第一武器」的「政府經費節減與地租減輕」，看上去似乎有些「淺薄」，然而在今天，「乃是佔據了有利的地形」（即有利的地位）。這一策略「確是投合了中等以下大多數人民的意願」。而這也是井上自己的想法。

迎來危機

山縣有朋首相也覺得一月十二日的內閣決議不符合自己的本意，他在二十四日致大藏大臣松方的信函中表示，即便認可對政府經費進

行削減，但其削減下的金額不宜用於減輕地租，而應該用於擴張海軍和興修水利上。松方正義是一個被伊東已代治貶斥為「優柔寡斷的先生」的人物，山縣在信函中想要拚命說服松方。

二月五日，井上向山縣首相指出，對眾議院的決議如果處置不當，有可能將貴族院也置於自己的對立面。貴族院秘書長伊東已代治二月二十三日致函伊藤博文說：「或許因為形勢出現狂風巨浪而不得不解散議會。」日本最初的帝國議會，有可能迎來預算審議未了、議會解散的事態，此時的局面最為嚴峻。

眾議院的 形勢轉換

從一月九日開始，將審定案交由眾議院正式會議審議。廢棄審定案的動議，兩次遭到了否決。非民黨的議員中也有人贊同「削減政府經費」，「削減政府經費」成了眾議院多數派的意見，不過，在有關憲法六十七條的預算削減問題上，意見的對立依然持續。

經過井上毅等人的努力，大成會的天野若圓提出了一項緊急動議，要求眾議院在討論確定六十七條費用項目前應徵得政府的同意。二月二十日，天野的動議以一百三十七票贊成、一百零八票反對獲得了通過。投贊成票的議員中，有自由黨中原先屬於愛國公黨的人。他們退出了自由黨，組成了自由俱樂部。板垣退助

也在二十六日退出了自由黨。

二十一日，自由黨的中江篤介（號兆民）議員以「酒精中毒、行走困難」為由提出了辭呈。二十七日，眾議院以一票之差接受了中江兆民的辭呈。中江兆民在自由黨的機關報《立憲自由新聞》上痛斥道，如今的眾議院在政府面前「軟弱無力」，成了「一群可憐蟲的陳列場」。於是，議會「就如同突然出現了電閃雷鳴一般，發生了大逆轉」（《山縣有朋公爵傳》）。

二十六日電眾議院，通過了特別委員選出議案，九名特別委員都讓大成會等一派獨佔了。在選出了特別委員後的一個小時，傳來了天皇的詔敕，命令會期延長九天。

被選出的特別委員，從傍晚起立即與政府展開了協商。被報紙譏諷為「軟派」的特別委員，其主張倒是與眾議院多數派的意見很接近。他們向政府施加壓力，認為政府也應該接受眾議院通過的減輕地租和削減政府開支的決議。

政府委員對於減輕地租不發表意見，而對於削減政府支出則最後同意削減六百五十一萬日元。這一金額要比政府當初預想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因為眾議院以「中等以下多數人的民意」為支撐，對政府表現了強烈的反彈，政府為使第一次的國家預算案獲得通過，不得不做出了一定的讓步。

從減輕地租轉向國防和水利

雖然政府在私下認可了採用減輕地租的政策，但見到天野動議案以後眾議院的動向，態度又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在二月二十七日夜裡舉行的緊急內閣會議上，以減輕地租的主張「實行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且在政略上也不是上策」為理由，決定放棄這一做法，認為將節儉下來的費用「用於國家當務之急的國務以及水利兩個方面」，於是做出了國防和水利增加費用的決策。

對於將吏黨和無黨派議員也捲入進來並形成了眾議院多數派的主張節儉政府開支的意見，政府雖然也予以了認可，但對於民黨主張的將此費用用於減輕地租的要求，則不願意做出讓步，政府要用國防水利增資的策略來粉碎民黨減輕地租的主張，這是一個預見到了今後政局變化的政治方針上的決定。增加國防預算和用於明治以後迅速惡化的山水治理，這樣的方針有可能獲得民黨的支持。

三月二日下午的眾議院大會，通過了包括削減六百五十一萬日元的「明治二十四年度預算案」（贊成一百五十七票，反對一百二十五票）。這一瞬間，政府實現了在眾議院通過預算案的政治謀算、民黨則實現了確保預算案審議權的政治訴求。

在三月三日上午貴族院的大會上，才終於提交了預算案，距離延長後的會期

也只有最後五天了。在會議上，雖然也有人對眾議院通過的預算案在貴族院進行走過場的表決表示了激烈的反對，但松方大藏大臣等對大家反覆說明，預算案若遭到否決，「事關國家大事，後果堪憂。」於是大多數議員被說服了。貴族院也同意了「削減政府費用」的要求。在五日上午到六日，對五日凌晨兩點完成了審查的預算委員會的報告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審議，最後預算案獲得了通過。這樣，「明治二十四年度預算案」就算定下來了。使國家政權發生了搖晃的第一屆議會就此結束了。

松方內閣 的成立

三月八日上午在宮中舉行的貴族院會議閉幕儀式，天皇、山縣首相、貴族院議長伊藤與第一屆議會的主要人物都沒有出席。第一屆議會雖然進行了最後，但想到議會運作的困難，大家都覺得不輕鬆，因而出現了上述的結果。

山縣在議會結束的三月所患的感冒雖然痊癒了，但覺得「元氣已不如從前，於是痛下決心」（《明治天皇紀》七），在四月九日上奏天皇，請求辭職，並薦舉伊藤重新出山。但伊藤和西鄉從道都表示了拒絕，於是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兼任了首相。五月六日，松方內閣成立。

松方內閣只是走了一個山縣，其他內閣大臣都留任。如何掌握好對付議會的舵，作為薩摩派元勳的松方，雖然有些躊躇，但覺得自己還是能夠擔當重任，於是出任了內閣的首長。

民黨的 課題

民黨也有一大堆課題。此前把重點都放在了預算案的審議上了，而未能充分及時提出新的法案並使其成立，覺得有負選民的重託。原本屬於自由黨的井上角五郎對民黨在這次議會的表现說：「未能商定一個重要的議案，未能討論和通過各種各樣的法律。」在提交的五十三項法律議案中，通過的只有六項，佔百分之十一，很多都沒有時間審議了。在明治時期的帝國議會上，由議員提出的立法提案每屆議會平均四十九項，大正時期為二十九點六項，昭和時期為二十二點五項，由此可知，在最初二十年中議會的提案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但這一氣象在第一屆議會時尚未顯出端倪。

立憲自由黨顯出了它的組織協調力的軟弱，因此需要加強這方面的能力。在三月二十日舉行的黨員大會上，原本由幹事組成的集體領導體制改為由總務（總理）一個人掌權的個人領導體制，新設置的總務（總理）一職，選舉了再次入黨的板垣退助來擔任。黨名也去除了「立憲」兩個字。改變了此前欲與立憲改進黨

合併的想法，著重加強自己政黨的建設。

民黨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十一月舉行了板垣退助與大隈重信的會見，四個團體（自由黨、改進黨、自由俱樂部、無黨派議員）的聚餐會，其結果是，自由俱樂部（土佐派）歸併到了自由黨。自由黨的組織結構，排除了大井憲太郎等的院外團體，而建設一個以議員為中心的政黨。

民黨（包括原本就是議員政黨的立憲改進黨）正在朝著超越藩閥的體現了新
的權力結構的「政黨內閣」的方向逐漸演變。

三、轉向積極主義

從消極退 守轉向積 極主動

民黨在帝國議會上以多數派的意見成功實現了削減政府開支，迫使政府在這一點上做出了讓步，但在削減下來的六百五十萬日元用於
哪些領域上最後卻懸而未決。民黨所提出的削減五釐地租的地租修
改條例這一修正案，因為遭到了貴族院的否決，從年度支出中削減
下來的六百五十萬日元，就這樣擱在了國庫裡。關注到了這一點並力圖挽回頹勢
而向政府建言的，是法制局局長井上毅。

七月五日，井上致書伊藤博文，表示政府不能像以前的內閣那樣採取消極退守的態度，而應將削減下來的六百五十萬日元積極地用於水利、興業銀行、購買鐵路、北海道開發上。要以培育產業等的「事實」在議會上做出積極的應對，如若不然，政府就難以進行運作。這就是井上的戰略構想。這一「積極主動」的姿態，就是要在政治上切入民黨的政治基盤，並在財政上主動出擊。松方首相也贊同這一想法，於是在第二屆議會上提出了上述方案。

大津事件

松方內閣成立的五天之後的五月十一日，發生了一件大事。來日本訪問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亞歷山大洛維奇（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滋賀縣大津町，遭到了擔任沿路警備的警察的襲擊而受傷。這是皇太子與他的堂弟、希臘王室的蓋奧爾吉奧斯親王一起率領俄國七艘軍艦從長崎經海路前往東京的途中發生的事情。

在對犯人津田三藏的處理上，松方首相認為，應該適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對於天皇三后皇太子施加危害或企圖施加危害者處以死刑」，對罪犯判處死罪。但是大審院長兒島惟謙對此進行了堅決的反抗，認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只適用於天皇等，而不能適用於外國的皇太子，應根據法律來判決（罪法定原則），



圖 1-4 「俄國皇太子抵京圖」（東州勝月畫，一八九一年）。描繪的是來日本訪問的皇太子尼古拉在東京車站受到天皇皇后歡迎的場景，不過這是一幅想像畫，因天津事件的發生，皇太子未去東京便回國了。

而不應聽從內閣的政治決定。司法省內的司法省顧問巴特爾諾斯特羅也認為，應該以一般謀殺未遂罪來定罪，與兒島院長的意見幾乎一致。這樣的話，就按照刑法二百九十二條（死刑）、第一百一十二條（未遂者其徒刑減去一等或二等）、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項（重罪適用於前一條），應判處犯人無期徒刑（包括重勞動）。

在十五日的御前會議上，總檢察長三好退藏表示，法官的意見是一般謀殺罪。對此，伊藤認為，「已經頒佈了戒嚴令，當處以極刑」，應當以第一百一十六條來量刑。政府主導，要按照第一百一十六條來判刑，如此一來，就不是按照通常的地方法院↓控訴院↓大審院這樣的三審制，而一下子就硬要由大審院來審理了。但是，七名法官，一方面由於兒島院長的堅持，一方面也因為山田法務大臣的「無聲的理解」（楠精一郎《兒島惟謙》），因而做出了獨立的判決，而沒有聽從政府的意見。結果，按照刑法二百九十二條，以「謀殺未遂罪」判處了無期徒刑。

司法權獨立與法律專家制度

兒島為甚麼要堅決反對將此案適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並將自己的意見貫徹到底呢？在兒島提交給松方首相和山田法務大臣的《意見書》（《大津事件日誌》）中，他表示，自己不是從三權分立的立場，而是以不溯及原則和罪刑法定原理來反對歐美對這一事件的介入，因此，司法權的獨立是很重要的。

但是松方首相對此反駁說：「有國家存在才有法律的存在，國家若不存在，法律也就沒有了生命。」而兒島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頂住了來自政府的壓力，是因為那時法律專家制度正漸趨建立的緣故。這項制度規定，法官和檢察官因為其專業性很強的緣故，因而是終身制的，確保他們的身份獲得保障，才能保證司法獨立這一憲法上的規定。

松方內閣改組的意義

在大津事件的處理上，產生了不和諧的聲音。伊藤在外務大臣青木面前感歎道：「每一件事都要插手，好像一身兼任了外務大臣和內務大臣的兩項職權，如此下去，我心頭難以平息。」（《青木周藏自傳》）伊藤全身心地投入了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他的這種行為和權力，瓦解了剛剛開始啟動的松方內閣。大津事件之後，青木外務大臣在五月二十九日引

咎辭職，樞密顧問榎本武揚接替了他的職務。三天之後，內務大臣西鄉、法務大臣山田、文部大臣芳川也提出了辭呈。

改組後的松方內閣（有內閣大臣十人），在兩點上顯出了與以前內閣不同的色彩，其一是除松方本人外，沒有一個元勳級的人物；其二是藩閥主流的薩摩藩和長州藩出身的人只剩下了四人。薩摩和長州兩藩出身的被認為是擁有較大政治權力的元勳級的八個人，在此前的三屆內閣中，或者是全體、至少也是半數以上的人加入了內閣。但到了松方改組過的內閣，除了松方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接受內閣大臣的職位，由此，歷史上形成的「事實上的權力」（元勳級政治家集團）從內閣之外，對「制度上的權力機構」的內閣開始施加影響力了。新聞媒體對此揶揄說，這是一個「二流內閣」、「傀儡內閣」。因為在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的背後有山縣有朋、農商大臣陸奧的背後有伊藤博文這樣的「黑幕」存在。

社會上一般認為，只要在密室的政治集團中留有「藩閥」這樣的根基，權力結構的分化就難以避免，它反而會招致政治的不穩定。因此人們期盼政黨政治或者是政黨內閣的誕生。

第二屆議會與海軍擴張預算

採取了「積極政策」的松方內閣，其「明治二十五年度預算案」，在一八九〇年度剩餘的六百四十五萬日元的基礎上，再將上一年度剩餘的五百二十一萬日元加上，將其總和的一千一百六十六萬日元作為臨時的財源，從中提取九百零七萬日元建立了一個連續事業的六年計劃，用於陸軍軍備費、軍艦建造費、煉鋼廠建造費、河道修築費、北海道土地調查費等，並從中首先提取了三百一十五萬日元編入了年度支出的預算。建造煉鋼廠，是為了生產「製造武器艦船最需要的材料鋼鐵」（《松方首相演說》），這是一項在擴張軍備和振興產業上推出大膽舉措的年度支出預算案。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幕的第二屆議會上，內閣一開始就要求議會批准第四十六號緊急敕令。這一敕令是在大津事件發生時，內務大臣在五月十六日公佈實施的，其內容是要對報紙雜誌、文書圖書實行事先審查，違者將處以短期禁錮、罰款等刑事處罰。根據憲法第八條第二項，需要得到帝國議會的事後批准。內務大臣品川在提案中表示，是為了「今後萬一的需要做準備」，意思是這一敕令將長久執行下去。「緊急敕令」雖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應，但事先無需徵得議會的同意，只與樞密院有關，也就是所謂的「非議會立法」。緊急敕令第一

次的事後審議會是怎樣進行的呢？這將考驗帝國議會在立法權上的真正價值。但是審議還沒有結束時，第二屆議會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遭到了了解散，因此這一審議被帶到了第三屆議會。

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討論決定，將削減海軍省臨時預算中的用於軍艦建造費和鋼廠建造費等的七百九十四萬日元，並在十二月十四日向全體大會報告了這一決議。松方首相就憲法第六十七條，對此「明確表示堅決的不同意」，顯出了決不妥協的強硬姿態。

十二月二十二日，登上了眾議院大會講壇的海軍大臣樺山資紀，對削減建造軍艦的費用大為惱火，發表了沒有講稿而充滿了「生氣」的講話（《每日新聞》，十二月二十三日）：

現在的政府是在度過了國內外的種種難關而生存到今天的政府。有人說是薩摩長州藩的政府或者甚麼政府，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保障了國家今天的安寧，與四千萬的生靈都無關，確保了國家安全的，是誰的功効呢？（笑聲四

起）（《眾議院議事速記錄》三）

這番講話激起了全場的一片譁然。報紙立即發佈號外，說是「自議會開會以來前所未有的大騷亂」。翌日的報紙抨擊他「失言」，後來這場演說被稱為「蠻橫而大膽的演說」。

當晚舉行的內閣會議，特別是列席者的樞密顧問官井上、樞密院秘書長伊東分別建議解散眾議院，但遭到了郵電大臣後藤象二郎、農商大臣陸奧的堅決反對，此時直至第二天的內閣會議也沒有作出結論。

明治天皇 與眾議院 解散

對這一狀態感到不安的明治天皇，在二十三日夜晚派了一名特使到松方那裡，詢問議會的對策。天皇的這一舉動，促使舉棋不決的松方做出了決定。當二十五日的眾議院大會決定削減總額八百九十二萬日元預算的時候，松方向天皇奏請解散眾議院。在內閣大臣中，陸奧和後藤不同意解散，陸奧甚至威脅說，如果做出解散決定的話，有可能辭職以表示抗議。天皇規勸松方盡可能避免內閣的分裂，於是松方最後說服了陸奧等人。

由於天皇對實際政治的參與，僵局被打開了。對於這一局面，伊藤博文持樂觀的態度，他請求天皇頒佈一道詔敕，意謂政黨「只是一味喧囂紛爭，而誤了國

家百年大計，此實非朕之所望」，以此來壓制反政府的聲浪。但井上毅對此表示堅決反對，謂「這有政略家利用王室之嫌」（《伊東致伊藤書簡》），於是這一動議沒有實施。

解散的結果，就意味著執行上一年度的預算。第二屆議會持續了第一屆議會的狀態，即審議預算成了議題的中心，而重要的法案卻無法通過。如此一來，各地的豪門大族對於政黨的目光就變得嚴峻起來了。

伊藤博文的新黨計劃

伊藤對眼下的事態感到憂慮，給松方內閣發出了一封警告書，陳述了十二條「內閣不鞏固的原因」（《伊藤博文傳》），在最後寫道：「第十二，依恃黑幕為後盾，卻不知其責任之重大。」他指出，「制度上的權力機構」的內閣，卻依靠「事實上的權力勢力」的元勳來展開政府運作，因此內閣就無法展開統一的步驟。已經認識到了兩個權力之間的矛盾的伊藤，在一月份上奏天皇，表示自己準備組織一個政黨，「組織一個標榜天皇主權大義的政黨，以壓倒主張自由民權的黨派，從而來支持政府。」（同上出處）他打算組織一個以大成會為中心的四十到五十名黨員左右的新政黨（最大的黨派自由黨是九十二名，立憲改進黨是四十三名）。

對這一想法，且不說天皇了，連井上馨、黑田清隆、品川彌二郎、榎本武揚、山縣有朋等也都不贊成。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元勳會議（伊藤、山縣、井上、黑田、松方、西鄉、大山）上，伊藤見到大部分人都不贊成自己的意見，於是便託病提出了樞密院議長一職的辭呈。二十六日，天皇表示不接受辭呈，同時，伊藤組織新政黨的活動也偃旗息鼓了。

第二次大選及對大選的干涉

一八九二年二月十五日舉行了第二次臨時大選的投票。品川內務大臣和樺山海軍大臣主張，應該趁大選之際，竭力搞垮民黨，而陸奧農商大臣和後藤郵電大臣則反對這樣的做法，認為還是應該以立憲政治為本義，不過政府還是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大選對策。在議會解散不久，就立即設立了由松方首相、品川內務大臣、白根專一內務次官等組成的非官方的選舉對策本部，由宮內省內藏頭^①杉孫七郎掌管的內閣機密基金中撥出了五十萬日元以及天皇的個人錢款十萬日元共六十萬日元作為活動經費。

據政府的調查，在兩府（京都府、大阪府）和八個縣發生了死亡二十五人、

^① 內藏頭是官名，是主管皇室開支的內藏寮的長官，其歷史可追溯到八世紀的律令制時代。

受傷三百八十一人的流血事件，民黨強烈譴責這是「干涉選舉」。各府縣知事以及底下的警察當局領會了政府的意圖，在強烈的使命感和危機感的驅使下，他們做出了激烈的極端行為，從而釀成了重大事件。

干涉的結果是，自由黨獲得了九十四席、立憲改進黨獲得了三十八席，離過半數還差十八席，但是還是取得了三百個議席中的百分之四十四的席位，可謂戰果不壞。即便不是松方、品川等直接下達的指示，但這次大選染上了血的色彩，他們還是遭到了輿論的強烈譴責。因為這次「干涉選舉」釀成的重大事件，導致了松方等薩摩藩出身的元勳政治家與伊藤博文等長州藩出身的元勳政治家之間出現了分裂的端倪。

結語——「光輝的明治」論與民族主義

戰後就 是戰前 的社會

人們在回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日本社會時，會覺得這是一個戰爭接連不斷的時代。換一種別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一場戰爭結束後，照理是迎來了戰後的時代，但實際上每一個戰後都是迎接一場新的戰爭的戰前。如果是一場戰爭突然降臨的話，那中間的這段時期還可以說是戰後，但實際上這段時期卻是在準備下一場戰爭，我們不得不說這是戰前。那麼人們為甚麼要連續不斷地製造這樣緊張的時期呢？

日清戰爭從清國那裡奪來了台灣、並將其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這原本不是這場戰爭的目的。日本單獨或者是與歐美各國列強一起來共同管理朝鮮、將朝鮮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才是戰爭的目的。經過日清戰爭，雖然來自日本的壓力很大，但朝鮮王朝和朝鮮政府並未動搖，對於日本強烈的統治企圖他們不斷進行反抗，並未屈服。日本為了要謀求奪回在朝鮮（韓國）的整個權益，不斷摸索多維度的外交活動，最後決定打一場日俄戰爭。乘著戰勝的勢頭，一九一〇年原本的獨立國家韓國被日本帝國合併，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這裡是本書要敘述的範圍。

媒體人三浦鏡太郎（一八七四—一九七二）於韓國合併一年後，在雜誌《東洋時報》一九一一年九月號上撰文認為，現代日本的危險「第一在於因軍備費用過重而使

國民陷於疲敝」，對此進行了批判，「我國在日俄戰爭以後陸軍擴張了兩倍。或者是包藏了分割支那的野心，或者是想要征服西伯利亞，如果沒有那樣雄心壯志的話，擴軍的意義就無法理解。」他已經預見到了以後陸軍和日本的發展方向。

（松尾尊允編《大日本主義還是小日本主義》）

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是殘酷的，朝鮮民眾跨過了鴨綠江逃到了中國的東北部（所謂的「滿州」地區）。要阻止自立的朝鮮民眾從「滿州」向朝鮮發生影響，成了日本的課題。日本要追求的是，擴大在滿州的影響、穩定在朝鮮的統治，為此不惜選擇軍事解決的手段，這就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的形象吧。

其轉折點就是日清戰爭。軍事力量在國家和社會中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因而小國日本的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兩點現象的產生，都在這一時期。

統治階層 的形成與 殖民地

東京大學在一八八六年帝國大學令發佈後成了唯一的「帝國大學」。「帝國大學」這一名稱的由來，就在於「根據國家的需要教授學術技藝」，也就是說其教育的目標是培育國家的官僚。為了能進入東京唯一的一所帝國大學，在全國的高等學校^①（從第一到第八，均為

^① 從教育程度上來說相當於高中，但比現在的高中水平要高，當時總數只有八所，被認為是進入帝國大學的階梯。中國留學生郭沫若曾進入位於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後考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

官立高中）集聚了各地學生，邁出了走向國家官僚的進程。這一情形，在日清戰爭以後出現了變化。

作為第二帝國大學的京都帝國大學建立於一八九七年。以後又建立了東北（一九〇七年）、九州（一九一二年）、北海道（一九一八年）、京城（一九二四年）、台北（一九二八年）、大阪（一九三一年）和名古屋（一九三九年）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首先設立的是理工科大學（當年的九月），在當時，培養工程師是第二家以後的帝國大學的職責。兩年後的一八九九年所開設的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人們期待它能成為與東京帝國大學相拮抗的培養國家官僚的機構，但其合格者的人數遠遠不及東京帝國大學。（潮木守一《京都帝國大學的挑戰》）後來所有的帝國大學內都設立了理科大學、醫科大學、工科大學（北海道和九州還設立了農科大學、京城設立了醫科和理工、台北設立了理農），通過學科的設置來突出它的重點，以國家之手來培養工程學和醫療領域的技術精英。

在帝國大學中單獨擁有法學部的，結果只有東京和京都（東北、九州、京城是法文學部、台北是文政學部），其他都是理工科的大學，在戰前的教育社會中處於頂尖的地位。

戰前國家官僚的官場社會的結構中，文官處於頂點，技術人員位居其下。從

東大或京大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文官，一定處於優越的地位，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久從官僚畢業後就成為政治家，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政治上的統治階層。這樣的道路，出生並在殖民地長大的「新國民」是很難踏入的。

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的帝國大學，是一個台灣人、朝鮮人和日本人共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但這裡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視的構造。（田村志津枝《台灣人和日本人》）在此之前進入中學之際及在中學期間，就存在著對台灣人和朝鮮人的歧視，在掌握作為外國語的日語上也存在著差異。在北海道、台北、京城三所大學裡，設有「預科」課程，預科的畢業生有義務升入該帝國大學，若要自由地考入東大或京大，則須跨過這樣的障礙，即必須進入「內地」的高中，若是台灣的話，則必須進入台北高中。「外地」的帝國大學，也接受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原本以高中程度的教育機關為終點的日本人，原本無法進入「內地」帝國大學的年輕人可通過這樣的迂迴戰術進入到「外地」的帝國大學。因此，對於「新國民」來說，他們能進入的門戶就很狹窄了。

包括大學在內的「外地」的學校，台灣和朝鮮的總督就代替文部大臣行使管理管轄的權力。不言而喻，朝鮮、台灣的高等教育機關的作用，不是培養國家的官僚，而是培養殖民地經營的人才。京城帝大設立理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一年，台

北帝大設立工學部是在一九四三年。都是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軍需工業增產的年代，必須培養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

兩種「國民」的形

二十世紀末以來，在日本廣泛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日本對於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政策，只是將「先進的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移植到「落後的地區」而已，並不是像歐美那樣推行一種「極壞的殖民地統治」。根據迄今為止的詳細研究，這樣的「說法」是一種只需付之一笑的低水平的論點。根據經濟史的研究，台灣是被作為製糖和南進的據點而開發起來的，它只是在充實日本內地的生活和擴張國土上發揮著作用，並未實施過單純的開發政策。

此外在「先進」、「落後」這種說法的基底裡，顯現出了歧視的意識。合併韓國，是日本覺得對腐敗的朝鮮王朝負有責任、因而積極地將其作為殖民地，「先進」、「落後」的說法則遮蔽了這一實狀，甚至讓人感到日本將其作為殖民地是正當的。在韓國合併條約簽署的當晚，寺內正毅總監在給山縣有朋的信函中這樣寫道：

接下去要做的，是官衙的廢除與合併、對日本官吏的處置。據此前調查的情況，官吏腐敗的情況出人意料。將這些人淘汰革職，將是一件甚為棘手的事。總體而言，處理日本人要比處理韓國人困難。

信函中感歎道，合併後的「一件甚為棘手的事」，是對腐敗的日本官吏的處理。現狀使他覺得，已經在蔓延的日本官吏的腐敗，在進入日本帝國總督府的時代之後，將會變得更加難以處置了吧。這是因為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驕橫跋扈，他們難以自我約束自我反省。

一九一〇年以後的日本，是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大日本帝國」。「帝國」裡，既有受大日本帝國憲法保護的「國民」，也有根本就進不了這一保護傘的「國民」。這之間的鴻溝是很大的。納稅的義務是有的，參加國政的權利沒有。受教育的義務是沒有的，在那裡所設立的大學組織，不是有關統治的法學部和掌握了產業經營關鍵的經濟學部，而只限於實利和技術的學部。朝鮮和台灣的民眾雖然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同時也沒有拿起武器接受軍訓來保衛自己鄉土的權利，這就是台灣和朝鮮的「國民」。

所謂的「殖民地統治」，不管本國在殖民地投下了多大的資本，其原本的目的

的就是為了本國的繁榮，而不是相反。「憲法」這一大法，是國民國家的智慧之一。它規定了國民的權利和義務，雖然因不同的人而在種族、民族、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但並不承認在對待人本身有任何的差異。殖民地的存在，與這樣的憲法是矛盾的。

長期以來為這一矛盾而苦惱的法蘭西共和國，結果在一九六二年三月，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設法去消解這一矛盾。這一過程中，諸如薩特等一批法國現代思想家，不斷地提出了這一問題，給世界以很大的衝擊。殖民地是由帝國的歷史所帶來的結果，為甚麼就不能放棄呢？但是近代日本從來就沒有受到過這樣重大的思想課題的歷練，而是因為一九四五年的戰敗這一「外來的壓力」而放棄了台灣和朝鮮，從而簡單地「解決」了「殖民地問題」。我們不需反覆不斷地回想起這一段歷史的經緯。這一經緯的起點，就是「日清戰爭至日俄戰爭」這段時期。認真地回顧歷史，就是一次不斷地挖掘思考的材料、拓展思維，使思想飛躍的冒險旅行。

後記

在走上研究日本近代史道路的時候，曾想過甚麼時候自己可以寫一部「通史」吧。真的想嘗試的時候，才感覺竟然有如此的艱苦，其艱難程度出人意料。然而終於也一點一點地詳細地撰寫起來，史料也一份一份地加以考訂確認，著手做了起來。雖然也有新的發現，但限於篇幅，我的解說到底能達到怎樣的程度，至今心裡仍然沒有底。

不過一旦參加到這樣的系列讀物的策劃中，覺得編輯會議很令人愉快。這次也是開了好幾次商討會，大家毫無顧忌地發表了自己的構思和意見。沒有顧慮和忌諱，是這次撰寫成員的特色。大家也討論了貫穿於整個系列的編輯方針，最終水落石出的，是在最後的一卷吧。各位讀者，且在內心想像一下，期待著最後的揭曉吧。

撰寫雖然是辛苦的，且在這一期間，我深切感受到，這二十年來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的進展是很大的。而且，不僅每個時代都會出現舉起破壞大旗的年輕的研究者，並且也包括了許多成熟的研究者，他們都會帶著敏銳的問題意識並通過確

擊的實證研究，向我們展現出深刻而嶄新的認識。本書就是吸收了這些重大的成果和可貴的認識高度、並將我自己粗淺的嘗試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結果。只是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正文中引用的文獻無法用各種詳細的符號表示，且無法一一註明作者姓氏，只能留待最後所附的參考文獻了，這是要向各位表示歉意的。

幾乎所有的文獻都是在我供職單位的圖書館裡找到的，朝鮮語專有名詞的念法，則得到了我的同事太田修先生的幫助。也謹向本單位的各位表示謝意。

本書的出版，編輯部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在編輯上做出的努力甚大，且白石玲子女士也一直在背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向兩位表示感謝。

原田敬一 於洛北^① 紫野

二〇〇七年一月

① 大約從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八五年）起，因為景仰中國，日本人也將京都（其時稱為平安京）稱為「洛陽」，這裡的「洛北」，也就是現在京都的北部。另有一說，「洛陽」是平安京中左京（東部）的異稱，右京則曰「長安」，但後來一般將整個京都異稱為「洛陽」。其影響，一直沿革至今。